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1月,第37卷第1期,Jan.,2007,Vol.37,No.1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哲学与宗教】

麦金太尔与传统德性理论的复兴

何睿洁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道德生活和伦理理论处于深刻的危机中,要摆脱这个危机,就要向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德性理论回归。通过分析西方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可知近代的道德证明都是失败的,传统的德性理论有助于我们寻求道德的形而上依据。中西传统的道德哲学可说是异旨同归,都强调人对价值、对善的追求,强调人的道德生命,认为德性是人本性意义上的目的,追求最高的善和极至的美。

关键词:麦金太尔;《德性之后》;德性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7)01-0122-04

麦金太尔(A. MacIntyre 1929-)是现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促进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他的《德性之后》被批评家们誉为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伦理学研究的新的转折点”,意味着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复兴。

在《德性之后》一书中,麦金太尔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的成员们是否有可能以某种不同于启蒙运动及其西方后继者们的方式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上达到真正合乎理性的一致?”^{[1](P1-2)}他问自己“道德认识上的一致性是否可能”?这背后的本质问题其实是“道德何以可能”?他想找到社会成员们都认同的证明方式,想为道德寻求形而上的依据(排除近代以来的证明方式),使德性成为社会共同体追求的终极目标。

麦金太尔主张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德性理论,指出西方社会自古希腊到近代的整个历史的不同时期,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德性传统。但近代以来,历史的变迁使西方社会生活丧失了维持德性的背景条件,在伦理理论上流行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德观,摒弃了亚里士多德伦理体系中的目的论和人

性论。因而,现代西方道德和道德理论所承继的是传统道德和伦理理论的残片,西方道德生活和伦理理论处于深刻的危机中。要摆脱这个危机,就要向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回归。

一、现代西方道德哲学提出 三种类型的道德证明

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证明。它最关心的东西不是告诉人们应该遵守某些道德规范,而是说明人们为什么应该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启蒙的道德哲学任务是为现代道德提供一种证明,一种辩护,一种依据于人性和形而上学的论证。如果现代道德哲学是一种关于道德的证明,那么现代道德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论证?按照麦金太尔的分析,现代道德哲学主要提出了三种类型的论证,它们分别是由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和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提供的。

康德的伦理学从善良意志出发,善良意志又由实践理性产生,康德说:“我们终究被赋予了理性,作为实践能力,亦即作为一种能够给予意志以影响

收稿日期:2005-09-20;修回日期:2006-11-14

作者简介:何睿洁(1970—),女,陕西富平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从事中国哲学、唯物史观及价值哲学研究。

的能力,所以它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去完成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2]因此,对道德进行理性证明的任务就是对其进行理性检验的任务,这种理性检验区分出哪些道德“准则”(maxims)是决定意志的道德法则的真正表达,哪些则不是这样的表达。道德哲学的问题是给予这些道德“准则”以合理的(理性的)证明。这种道德证明对于康德就是一种道德检验:道德法则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为所有的人所遵循。这就要求道德法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法则不能以经验的道德行为、经验的善恶概念为前提条件,它不受任何经验制约,不为任何利益、感情、欲望所限制,否则它就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东西。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是形式的,而不能是关于内容的或涉及目的的。因为对于道德内容(如“幸福”),人们的观点总是不一致的。康德认为,只有从先验的“普遍立法的形式自身”出发,才能使道德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才能成为崇高的无比尊严的力量。

休谟把道德判断理解为情感的表达,主张推动人们行动的道德力量是“激情”(passions)而非“理性”。休谟说:“道德宁可说是被人感受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3]休谟认为道德判断不同于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科学判断,其联系词是“是”或“不是”;而道德判断则是一种人类的主观评价,是一种源自情感与激情的价值认知,其联系词是“应该”或“不应该”。道德上的善恶判断不是陈述行为实际是什么,而是表达行为是否正当,是否合理。休谟承认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应该符合普遍的法则,如“正义”。但是,如果当我们遵守这些道德法则(如“正义”)不利于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它们而不是违背它们呢?与康德的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相反,休谟在这里提出了“同情”的观念,认为任何利他主义行为都出自于人的情感。对于休谟,任何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无论是利己主义的还是利他主义的)都发自人的“激情”,而与理性无关。

克尔凯郭尔将“理性”和“激情”双双排除于道德证明之外,同时,他否定了两种道德哲学中的正面论证,主张道德不可能有一种合理的证明。克尔凯郭尔提出,作为全部哲学出发点的只能是个人,这种个人不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而是作为伦理主体的个人,是一种非理性的人。此个人的基本特点在于有绝对自由,他既不受任何外部条件的约束,也不受任何理性的、逻辑的规律和规则的约束,而仅仅按

照自由的情感做出决定和进行选择。克尔凯郭尔认为如果没有道德权威,没有合理的充足理由,那么,我们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归根结底取决于一种“根本选择”(radical choice),主张道德没有根据,没有标准,道德只能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麦金太尔认为,休谟、康德和克尔凯郭尔为西方的现代道德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明,且都企图运用人性的观念(“理性”、“激情”或个人“选择”)进行证明,但是这些证明都失败了。“因为在他们共有的道德法则和道德箴言的观念与他们的人性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1](P52)},而道德观念和人性观念之间的关系只有在适当的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二、西方传统道德理论的道德证明

麦金太尔指出,所有现代道德理论的本质都是个人主义的,把所有的人都看做是利己主义者。由于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利他主义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解释的,所以社会才需要利他主义来矫正过正,道德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等同于利他主义。但是对于亚里士多德,这种现代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根本不可能产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善对于我们所有成员是共同的,从而我追求的善不可能与其他人的善相冲突。善并不是私人财富,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而是所有人和每个人共有的。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德性传统强调这样一种社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先于个人,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道德思考的出发点。因此,德性的实践对于亚里士多德意义的幸福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恰恰具有中心性的意义。在人的“整体生活”中,特殊实践的利益被整合进了一个目标的总体模式中,这体现了人对好的、善的生活的追求。

麦金太尔在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时指出,它由三方面因素构成:(1)“偶然形成的人性”(未受教化状态下的人性);(2)“当人认识到自身的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以及(3),即由(1)向(2)的转变过程。三者之间需要彼此相互参照。他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认为它促使偶然的人性向可能性的人性转变,是灵魂由下降之路向上升之路“回归”的关键,也是“德性”塑造的基础。由(1)向(2)的转变被耶格尔称为“回转”(conversion,在基督教的德性伦理被称为皈依),因此,哲学教化的本质就是“回转”,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转回来。回转是

柏拉图式教化的一个特别的术语,事实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术语。它尤其指“整个灵魂”转回到至善这一理念的光照中,即宇宙的神圣源头。意即,如果“偶然形成的人性”能够接受伦理学的指导,按照道德箴言行事,就能发扬德性,禁绝罪恶,就能认识到我们的真正本性并达到我们的真实目的,而这样的人就成为“能够实现其本性的人”。

另外,“德性”一词的希腊文是 *arête*。*Arête* 本意是指自然事物的特长、用处和功能,例如马的 *arête* 是奔跑,鸟的 *arête* 是飞翔等等。随着希腊民族向市民社会过渡,*arête* 与人类社会生活方面的品性、特长、优点和才能联系在了一起,与表示价值判断的“善”获得了密切的关系。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arête* 被明确地称为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至的美。德性的概念启示我们,德性就是本性。德性就是指本然意义上人性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根据,现实的人只有在道德实践中努力返回(“回转”)自己的本性,追求最高的善和极至的美,才能达到自己的真实目的,才能成就人自身,才能挺立于天地之间。

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强调社会共同体,共同体先于个人;强调超越性,德性是最高的善和极至的美;强调德性是人本性意义上的目的。

三、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道德“证明”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对传统德性的呼唤,无疑是出自一种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的深刻思考。其实,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同样的道德危机,甚至可以说,我们的“道德传统”的破碎与西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现代化是以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传统道德已经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要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是不可能的。传统道德理论是根,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才有现代道德理论的勃勃生机。回归传统可为我们提供解决现代道德危机的思路。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古代的道德理论虽然都是朴素的,但它们都真实反映了善是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目的,是人作为一个种类所特有的追求目标,是人区别于万物的本质特征。需要说明一点,中国哲学具有直觉思维的特点,儒家的善不是逻辑证明的结果,而是人在道德实践中对本体之善的体悟。不过为了回应麦金太尔的问题,与西方道德理论对应,我们也用了证明的提法。这也是第三标题中“证明”加引号的用意。

中国有着比西方世界更为悠久的道德传统,这个传统的主流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伦理学说。它强调两点:首先,肯定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伦理学说中,充满了对人的肯定。人具有向上、向善的良知、仁心,承认人可以创造出更高度文化的能力,只有人才能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责任。人生的价值正在于有无数的责任要我们人类自己去完成,而不是依靠神和上帝,因此,人生活在天地之中,不应采取消极态度,而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应有所担当,在自身的道德实践中体现宇宙的大化流行;其次,重视道德生命。人,就如“人”字由一撇一捺所组成的一样,分为有形和无形两部分:一为物质载体,亦称自然生命,有生有死,与其他生物无异。二为上层建筑,即道德生命,又叫精神生命,这是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惟有人具有这种道德生命,具有善与不善的意识,这是人的本性。人生一世,应追求至善的人性目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必须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透过自我对群体的奉献,方可随大我的不朽而不朽。

具体讲,孔子的“仁”是先验的道德范畴,指高于生命的道德境界。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重视主观道德修养。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具有先验的善性,人生而有善端。人之性包涵“人之所以为人者”。失其性则与禽兽相同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5]仁即“人”所应有之本心;义即“人”所应由之路。若不“居仁由义”,则非人矣。宋代理学家张载将人性二重化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指宇宙全体之性,是先天的,至善的。气质之性是、物具备了自身的特殊形体后所具有的性,有善,有不善,是后天的。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6]气质之性是人与物所具有的共性,而不是人之为人的本性。那人区别于物的特性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反”。“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这里的“反”就是“回转”(conversion),回转至善这一理念的光照中,即宇宙的神圣源头。显然,纯粹至善,人之为人的本性就存在于“反”的过程中,也就在“善反”的过程中呈现。这个过程就是本体论的超越之路,就是超出实然的人性(气质之性),超出宇宙生化之流,将人性提升到天地在我之性。这也是为什么张载强调先识造化的原因。因为知天才能知人,有了本体论对人性论的统摄,人才会有宽广的宇宙意识,才能

体会出渗透在宇宙中的本体力量,明确人性的本质和根源。

综上所述,不论西方的德性传统,还是中国的道德传统,他们都具有共同之处,即对人充分肯定,指出人生(人类)的理想和所应追求的至善目标,强调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从而回归人的至善本性。而且把上述的一切作为人的行为的普遍性规范。也就是说,它们都有助于现代人走出迷茫与困惑,导引人们的价值诉求,回答了“人为什么要道德地活着”、“人应该成为怎样一个人”、“人应该如何去生活”等问题。回归德性传统,对医治世纪之交人类所表现出的在物质世界中自我的迷失,对人类追求的迷惘与缺乏自信,对只顾功利的追求而忘掉自身责任等等人类精神上的疾

患,无疑是一副良方,对人类具有崇高而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麦金太尔. 德性之后 [M]. 龚群, 戴扬毅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2]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M]. 苗力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45.
- [3] 休谟. 人性论 [M].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510.
- [4] 刘宝楠. 论语正义 [M] // 国学整理社. 诸子集成: 第 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337.
- [5] 焦循. 孟子正义 [M] // 国学整理社. 诸子集成: 第 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464.
- [6] 张载. 张载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23.

[责任编辑 陈 萍]

MacIntyre and the resurging of traditional ethics

HE Rui-jie

(School of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MacIntyre considers that modern ethics is in deep crisis, and back to Aristotle can help us to shake off the crisis. Through analyzing modern west ethics, we can see that modern morality testimonial was a failure; the traditional ethics can help mankind look for moral metaphysics. Although the specific thoughts of the wes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ere different, their main aims were alike. The value, the goodness and moral life were emphasized by both of them. It is universally believed that good morality is man's natural aim, which is also the best and the most beautiful.

Key words: MacIntyre; after the morality; morality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历史学会部分学者 与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云教授举行座谈会

2006 年 11 月 5 日,应陕西省历史学会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联合邀请,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与我省历史学会部分会员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术中心会议厅举行座谈会。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贾二强教授主持,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黄留珠先生(西北大学)、副会长赵世超先生、秘书长陈峰先生(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曹玮先生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钱耀鹏、冉万里、贾志刚及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晖、袁林、马瑞英等专家学者。

与会学者主要围绕历史学的文化使命、历史学如何在传统学科分割的夹缝中寻找生长点、打破学科界线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历史研究中系统论的运用、学术研究如何以人为本、在当今科学日益发达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多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给今日史学所带来的新挑战等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亲切交流与深入探讨。许倬云先生高度赞扬了陕西学界厚重宏大的传统风格,学识渊博且阅历丰富的他也带来了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向与全新理念。他的精辟见解与富于哲理的谈话引起在座学者的极大兴趣,收到了良好效果。

(薛 辑)